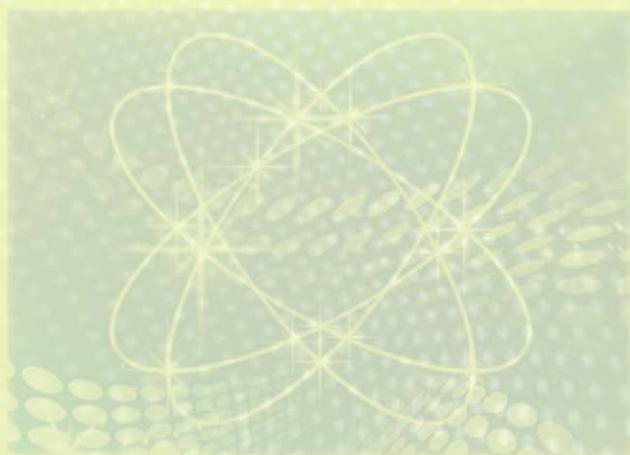


#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石 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志刚 朱方明 罗志田 段 峰 姜晓萍

项 楚 姚乐野 曹顺庆 黄宗贤 卿希泰

唐 磊 徐玖平 蒋永穆 霍 巍

# 丛书序

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九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的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其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 年至 1924 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校设立了 10 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 6 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 5 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校内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年5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儻（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麟（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

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是川大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 目 录

引言：扩充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维度·····	( 1 )
第一章 从“文”到“物”·····	( 15 )
一、中国上古史的真相·····	( 16 )
二、信史与“文”“物”·····	( 20 )
三、考古学的专门化·····	( 30 )
第二章 知识溯源与学科初建·····	( 39 )
一、地质学与古人类遗存知识的早期译介·····	( 41 )
二、从地质学到史学的考古学·····	( 47 )
三、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考古学·····	( 51 )
四、小结·····	( 57 )
第三章 传统介入：“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重塑·····	( 59 )
一、晚清的金石之学·····	( 59 )
二、清季金石之学与新学科体制·····	( 66 )
三、“金石学”“古器物学”与教科书·····	( 70 )
四、小结：金石学的“重建”·····	( 79 )
第四章 冲突与竞争：保护“学问的原料”·····	( 81 )
一、从新郑铜器的出土经过看各方参与者的目标与行动·····	( 81 )
二、各方对新郑遗物的初步研究·····	( 89 )
三、保护“学问的原料”·····	( 91 )
四、余论：“民族主义”抑或其他·····	( 95 )
第五章 “中国考古学之父”：“正当的历史观”与民族主义·····	( 97 )
一、理想：“去欧洲化”与“去民族化”·····	( 98 )
二、“以全人类为背景”：李济与傅斯年的“古史多元观”的交集·····	( 101 )
三、各种“文化因素”更加平等：殷商文化的更多来源·····	( 105 )
四、小结·····	( 109 )

第六章	“科学”在中国的两难处境：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111)
一、	摆脱“民族主义”的方法：体质、民族志与小范围区域比较·····	(112)
二、	中国民族史的范围·····	(117)
三、	人种研究的困境·····	(118)
四、	余论：为推动中国科学发展而坚持的人类体质研究·····	(123)
第七章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关于来源的一种解释·····	(126)
一、	中国人类学家的可能贡献：语言与比较·····	(128)
二、	作为“比较法”基础的“历史法”：小范围与细节发掘·····	(129)
三、	“历史法”对“比较法”的单向制约：器物分类有“逻辑”·····	(136)
四、	回应批评：讨论器物“功能”的路径·····	(142)
五、	要“准确”还是要“合理”·····	(146)

# 引言：扩充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维度

20世纪初，分科而治的现代学术体制登陆中国；一个世纪后，关于学术与制度的反思性讨论开始怀疑这种体制是否“天经地义”<sup>①</sup>。在中国历史学领域里的学术史反思，使得跨学科研究不仅更加名正言顺，而且成为学者竞相模仿的对象<sup>②</sup>。而在与历史学联系紧密的中国考古学领域，却出现了巩固学科营垒的建议<sup>③</sup>。

张忠培认为考古学应当与民族学严格分工<sup>④</sup>，而且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近百年来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次进步都产生于对考古学材料的研究与规律的发现，因此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也必然与本学科的独立意识密切相关<sup>⑤</sup>。事实上，把考古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整个20世纪相关学者们努力的目标。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李济常说，“现代考古学”一词，重点在“现代”二字之上，强调作为知识背景的“人类史的大题目”和具体的田野发掘方法<sup>⑥</sup>。这一词汇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仍被夏鼐沿用，改作“近代考古学”，

- 
- ① 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 ② 这主要是指隶属于历史学科的二三级学科之间的跨越，例如[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相关讨论参见罗志田：《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桑兵：《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 ③ 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 ④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3—248页。
- ⑤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 ⑥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李济文集》第5卷，2006年。文章原载《安阳发掘报告》，1930年第2期。

同样强调与金石学的区别，认为地质学的影响和疑古运动共同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序幕<sup>①</sup>。不过，李济与夏鼐的言说背景与 20 世纪末的学术背景完全不同。李、夏二人均可以在顾及中国“旧学根基”的前提下，强调现代考古学“现代”的那一面<sup>②</sup>，而不至于引发任何疑问。但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史建构中，到底“旧学”与“新学”<sup>③</sup>或具体而言“金石学”与“考古学”之间有着何种关系——隐含其间的问题就是谁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已经成为讨论的关键之处。

这个问题渊源于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动力的探究。美国汉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即“中国中心观”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判，强烈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子领域。当柯文（Paul A. Cohen）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中国中心观”时，是从“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三方面对此前三十年间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进行概括的。他认为，“这三种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 19、20 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其中，既包括因为此类观念而引起的情感倾向，如认为西方进步、中国落后；也包括因为此类观念而引起的研究范围之褊狭，如忽略那些与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柯文澄清自己的意图是“并不反对把诸如‘帝国主义’‘冲击—回应’，甚至‘近代的’这些词语严格而仔细地使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体过程或现象”。他反对的是“把这些概念当作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企图据此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什么是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什么是不重要的”<sup>④</sup>。但事实上，阐释方式直接影响人们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理解：到底是本土传统还是现代西方导致了各种变化？在柯文此书的中文版前言中，他提到包括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在内的四本出版于 1984 年和 1985 年的著作，认为它们都支持了自己的论点，即“倘想正确理解 19、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

① 夏鼐：《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 年第 3 期。“近代”与“现代”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是明确的两个时段，本文因涉及时人的称法，故不明确区分这两个时段，除特别说明外，“近代”与“现代”都指向 1840 年之后。

② 李济：《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序》，《李济文集》第 5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19 页。

③ 此处“旧学”与“新学”的用法，乃沿袭李济所处时期的习惯，但并不具有其背后暗藏的价值判断。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④ [美]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4 页。

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艾尔曼的书成为学术史领域里支持内部演变说的范例。

艾尔曼则承认是从孔飞力（Philip Kuhn）关于中国清代社会关系变化的著作中得到了提示：“只有假定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才能承认，惟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但是，“早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已开始崩溃瓦解”。他从 18—19 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学术圈子的研究中发现，“知识阶层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 18 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这种挑战明显反映于他们的语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的实证性研究之中。18 世纪的知识分子，运用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儒学遗产众多理论的合理性，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所充斥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sup>①</sup>。他将 18 世纪的考据学（考证学）与 20 世纪甲骨学研究崛起之间的联系作为证据，证明“现代中国学者从事的批评研究不仅是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影响的产物”，以及“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sup>②</sup>。

尽管艾尔曼此书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考据学风气形成的原因，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这一主题在构建一个中国近代史解释模式上所拥有的可能，而后者显然不如前者成功。艾尔曼的表述建立在外因与内因的二分状态下，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要么外因重要，要么内因重要。如果内部已经出现了“根本性”变革，就证明外因是次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即使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仍然要承认，惟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

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在 1985 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开头，提到了“年轻一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抛弃西方冲击论、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变化的趋势。但他认为，在中国的文明框架里并没有出现跟西方一样的传统与现代发生全盘质变性的决裂。“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

① [美]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

急剧变化的外在条件和新型心理情感 (sensibilities) 已经生成了全新的起点, 但是明清思想家全然无意于证明这一点。”他说, 因为“原始文本毕竟会为它的解释者的思想加上确定的外在限制, 镶嵌在特定的充满自我意识的传统 (如儒家) 之内的正典 (canonical) 文本体系, 可以决定性地造就后代思想家面向世界时所依恃的问题意识 (problematique), 正如治国术的传统可以持续地造就政治家的‘实际态度’一样”。正是由于“任何对待解释的真诚努力, 都必然包含着对于文本本身的深切关注”, 人们只有通过了解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才能对变化的程度和性质作出判断”<sup>①</sup>。从这个思路出发, 艾尔曼提出的考据学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变迁之间的联系, 就需要更具体详细的分析。

罗志田针对“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流行也提出过批评, 他提醒中国的研究者注意柯文一书的学术背景和针对对象, 以及中国几十年间自身学术发展的特点<sup>②</sup>。可以看到, 在“中国中心观”的口号下, 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学术界, 都出现了坚定地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 19 到 20 世纪变革的重要性的意见。

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简单的表态上, 从“金石学”到“考古学”的历史探索几乎才刚刚开始。张光直和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都曾提到过中国考古学受传统金石学的影响<sup>③</sup>, 但直到最近, 罗泰仍然在呼吁应当进行这个部分的研究<sup>④</sup>。“金石学”与“考古学”这对概念的联系源自 20 世纪初作为舶来品的“考古学”进入中国之时。但为什么是由“金石学”与之联系?“金石学”在晚清的学术领域里到底代表了什么? 它的繁荣标志着反对儒家经典和全部的宋明理学吗? 观察清代学术研究内部的变化与外部出现的冲击能否作出外因重要或内因重要这样的简单总结?

如果我们仍然简单地将最近百年的考古学视为完全超越前代的学术, 在研究目的、方法、手段、成果等各个方面都更“客观”和“全面”的东西, 那么上述问题的提出仍然不能拓宽目前的研究。不过, 已有学者对这一判断提出质疑。贝尔纳 (Martin Bernal) 认为:

过去一百五十年中, 历史学家声称他们拥有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方法

① [美] 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程钢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1 页。

② 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5 期。

③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 陈星灿译,《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第 10—30 页; [美] 罗泰:《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 陈淳译,《文物季刊》, 1995 年第 2 期。

④ [美] 罗泰:《从国际立场看当前的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报》, 2012 年 5 月 11 日第 5 版。

相类比的“方法”。实际上，现代历史学家区别于“前科学的”历史学家的方式要不确定得多。最好的早期作家是自省的，使用可信性的验证，并试图做到内部一贯性。而且，他们援引和评估他们的文献。与此相对照，19和20世纪“科学的”历史学家不能够给出对“证据”的形式证明，或者建立坚定的历史法则。而且，在今天，“方法论不合理”的控告不仅被用来谴责无能的作品，而且还被用来谴责不受欢迎的作品。这一控告不公正，因为它错误地暗示，存在其它方法论合理的研究来与之相对照。

他将“现代历史学家”与“‘前科学的’历史学家”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指出在学术领域的论争“不应该以证据为基础进行判断，而仅仅以有竞争力的可信性为基础”。但是，20世纪的史前史研究却“着迷于这一寻找证据的一种特殊形式”，他称之为“考古实证主义”，即“处理‘物品（objects）’使人‘客观（objective）’的谬论”，也即“对考古学证据的阐释和考古学发现本身一样坚实的观念”。“这一信念将考古学假设提升到‘科学的’地位，而将其其他来源的关于过去的信息降级——传说、地名、宗教崇拜、语言以及口头方言和书面方言的分布。”此外他还批评“考古学实证主义者”钟爱“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即如果某样东西没有被发现，它就不可能曾经以相当数量的形式存在的信念”<sup>①</sup>。

消除我们头脑里对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迷信”，将有助于在历史进程中发掘出更多的“非现代”因素，并给予它们更多的关注、理解和阐释。例如，章炳麟反对甲骨文释读，就需要结合他早年提倡“石史”的言论，以及中年时期建设“信史”的理论共同分析。这一态度绝不仅仅是“反动的”“保守”的，它代表了一种对实物史料与文字史料如何建设可靠历史的深度探索。

贝纳尔的观点是建立在比较“最好的早期作家”与现代历史学家的作品之上，将研究者的目光引向前者。但是，如果将“最好的”现代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挑选出来进行比较，后者是否还会存在他所说的那些缺点呢？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的考古学家，并不仅仅是“传统派”被脸谱化，即使所谓的“现代派”也同样被简单化了。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长期以来就是“现代派”的代表，在田野发掘方法、资料整理分类、人类学眼光等诸多方面开创了新局面。但是，他在实物史料与历史解释之间设置的严密规则却时常为后人所忽视。

① [美]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6-8页。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整体的现代考古学确实存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sup>①</sup>，在更广的范围里存在贝尔纳所说的“考古实证主义”的倾向。因此，把中国现代考古学置于清末民初史学变化的整体背景下，平等地考察争论各方，将可能产生对现代考古学发展有益的批评。

然而，大部分既存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自1920年以来出现的总结中国学术发展与出土遗物关系的著作，大部分都建立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且明显地偏爱“年轻”的“考古学”（不论其具体含义是什么，“考古学”一词基本上是指代一种新学科），以后起的考古学观念为标准收集历史上相似的学术研究的材料。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sup>②</sup>与王国维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sup>③</sup>叙述了甲骨、简牍等新史料的问世及研究之经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sup>④</sup>简要说明了金石学在清代的发展规模与分派。在1926年瑞典皇太子访华的欢迎会上，他将自宋以来的金石研究与最近考古发掘视为一个种类的工作，称之为“中国考古学”<sup>⑤</sup>。稍后卫聚贤出版了《中国考古小史》<sup>⑥</sup>与《中国考古学史》<sup>⑦</sup>，将传统金石学与新起的“发掘期”考古学研究贯穿一气。20世纪类似的作品还有：大概油印于20年代末的闻宥撰的《中国考古学》<sup>⑧</sup>；40年代裴文中撰《史前考古学基础》<sup>⑨</sup>略述中国“考古学的发达史”部分；张政烺的《中国考古学史讲义》<sup>⑩</sup>从孔子时代讲到清朝；阎文儒约作于5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史》<sup>⑪</sup>虽然区别此学之新旧两类，至少在篇幅上给清以前的“考古学”留下较多空间；徐苹芳为中科院考古所编《考古学基础》中撰写的《考古学简史》<sup>⑫</sup>，也曾强调“宋清以来金石学研究的基础”。

另一类学科史研究则将传统金石之学排除在所谓现代考古学的范围之外，强调后者的西学来源。例如，李济在1928年和1934年发表了《中国最近发现

① [加] 布鲁斯·G. 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社编：《考古学零简》，商务印书馆，1923年。

③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科学》，1926年第11卷第6期。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中华书局，1936年。

⑤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卫聚贤编：《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⑥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⑦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⑧ 闻宥：《中国考古学》，油印本，藏上海市图书馆。

⑨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⑩ 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

⑪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⑫ 徐苹芳：《考古学简史》，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58年。

之新史料<sup>①</sup>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sup>②</sup>两篇文章，明显与王国维、梁启超类似题目的文章意见相左。他不仅只关注于所谓现代考古学的发掘成果，并且刻意未谈有字史料的发现与研究。虽然他在1931年为卫聚贤的书所作的序中恳切地谈论宋人收集古器物的殷勤和清代文字学隆兴对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所作的铺垫<sup>③</sup>，却在1934年作的《城子崖·序》里宣称：“要是把现在的考古学与我们固有的金石学放在一个宗派里，岂不成了中国的胡人用改姓方法冒充黄帝子孙的那一套把戏”<sup>④</sup>。夏鼐于1979年发表《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强调近代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别，认为地质学的影响和疑古运动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俞旦初的《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sup>⑤</sup>从考古学界认可的本学科角度追溯学科早期历史，成为后来相关研究的重要模本。取向类似的还有：1986年王世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作的《中国考古学简史》，1991年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sup>⑥</sup>，1992年安金槐主编的《中国考古》<sup>⑦</sup>，1996年王宇信的《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sup>⑧</sup>，1997年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sup>⑨</sup>，2003年沈颂金的《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sup>⑩</sup>，2005年蔡凤书的《中日考古学的历程》<sup>⑪</sup>，2009年徐玲的《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sup>⑫</sup>以及许多学位论文。

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比学科史视野更宽广的学术史角度观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其结论往往引起考古学界内部的关注。例如，张光直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sup>⑬</sup>考察了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的成因及特点；罗泰在张光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定位，指出后者有着强烈的证史倾向，如对夏文化的寻找，并认为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① 李济：《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李济：《中国考古小史·序》，《中国考古小史》，第1页。

④ 李济：《城子崖·序》，《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8页。

⑤ 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⑥ 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⑦ 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⑧ 王宇信：《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1996年。

⑨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⑩ 沈颂金：《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学苑出版社，2003年。

⑪ 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齐鲁书社，2005年。

⑫ 徐玲：《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⑬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在新发现与制度变革的双重作用下产生了地方主义与多元化认识。罗泰的观察点虽然主要针对近几十年的中国考古学，但在探因溯源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如中国的史学编撰传统、疑古派动摇早期典籍的可信性对考古发掘的促进、金石文字学对考古学的影响<sup>①</sup>。罗泰的研究以及这一时期欧美学界讨论民族主义与各国考古学关系的风气影响很大，继起者如徐坚的《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把夏文化的探索史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指出它是在重建民族文化认知的情热下产生的<sup>②</sup>；沙白力（Barry Sautman）则讨论了中国人人类学研究中抵制非洲起源说而坚持本土进化观点的民族主义内涵<sup>③</sup>。

杜正胜从论史语所的新学术之路着手，对考古学的新方法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有较深入的探讨<sup>④</sup>；桑兵的《国学与汉学》一书述及金石考古学界与汉学家的交往<sup>⑤</sup>，又从中外学术合作的角度考察了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成果有限的原因<sup>⑥</sup>；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就 1929 年殷墟发掘中新旧学术典范之间的对立竞争做了具体而微的考察，勾画出新派史料观点的基本内容<sup>⑦</sup>；罗志田《文字、实物与知识：“二重证据法”提出前后对“地下材料”的认知》（大纲）从新旧两种考古学在民国学人认识中的纠葛出发，说明了现代考古学建立之时的思想背景<sup>⑧</sup>；徐坚则从安阳之外的考古学实践中，发现了存在于整个中国考古学领域的丰富性，所谓现代考古学，实际上有多个渠道在为它供给养料<sup>⑨</sup>。

上述几方面有关这一领域的历史考察仍有拓宽的可能。若要更平等地观察

① Falkenhausen L,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 67, 1993. Kohl P L, Fawcett C: The Regionalist Paradigm in Chinese Archaeology, ㉔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㉕,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徐坚：《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汉学研究》，2000 年 6 月第 18 卷第 1 期。

③ Sautman B, Peking M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leoanthropologi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0, no. 1, Feb. 2001.

④ 杜正胜：《傅斯年的史学革命》《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 年。

⑤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⑥ 桑兵：《东方考古学协会》，《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⑦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⑧ 罗志田的《文字、实物与知识：“二重证据法”提出前后对“地下材料”的认知》（大纲）为 2005 年 9 月复旦大学“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⑨ 徐坚：《暗流：1949 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 年。

金石学与考古学，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于后者是如何战胜前者，纠缠于那些后者有而前者没有的特点，或者发掘它们的共同点，而应当开始注意它们各自的学术“语境”，以及它们在其中的自我定位、目标和方法论。当艾尔曼提出“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20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连续性”时，他并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论证。正如史华兹所说，要了解“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先得分析文本与其解释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考察或许需要上溯到清代中期。阮元曾在《商周铜器说》中将自古以来对铜器的认识分成三个阶段，以北宋为第三阶段的开始，即不再视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是加以认真地考释研究<sup>①</sup>。此后众多论述金石学史者，大致依循此说，将北宋视为金石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段。虽历经元明两朝消沉，进入清代再度繁荣兴盛，尤其是从乾嘉到光宣的一百多年间，对金石古器的收集和著录兴趣持续升温。宋代金石学与清代金石学之间的差异，已有学者言及<sup>②</sup>；但是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与光宣时期金石学之间的差异，则少有论者。

阮元说：“形上谓之道，形下谓之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sup>③</sup>阮元此论，建立在“器”<sup>④</sup>的地位已经上升的乾嘉学术背景里。戴震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sup>⑤</sup>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强调文字训诂等乃“明道”的必循之阶，导致了梁启超所说的“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多方面研究的流行<sup>⑥</sup>。

即使有心与考据学派立异的章学诚，同样强调“器”的重要性，尽管双方各自所指的“器”有不同的内容。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开宗

① 阮元：《商周铜器说》下册，《擘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

②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卫聚贤编著：《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③ 阮元：《商周铜器说》上册，《擘经室集》。

④ 冯友兰解释说：“实际底事物，中国哲学中名之谓器。”清代学者常说中的“器”范围不定，时而较具体，指有形态的器物、有事实的制度，时而较宽泛，似指一切“有情有状”的东西。本文所用的“器”的意义，除引文外，均取后一种，接近冯友兰的解释。见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⑤ 戴震：《古经解诂沉序》，《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377、378页。

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

明义地提出清代考据学是儒学内在理路的自然发展，即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的过程。持“由经明道”主张的戴震与提出“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实皆面对着“儒家原始经典中的‘道’及其相关的主要观念究竟何所指”这种共同问题<sup>①</sup>。章学诚所说的“道”，既是六经记载的“周公之道”，也是存于“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中的“大道”，即余英时所谓“就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之全程而言”的“道”<sup>②</sup>。因此，“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文章、考证皆为“下学之器也”<sup>③</sup>。

尽管“道”与“器”这组词语在不同的学者那里，甚至同一学者的不同表述中意思都不一样，但这个二元结构是广泛存在的。例如，提倡“复礼”的凌廷堪，不用“器”而用“礼”来表达与“道”的关系，“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sup>④</sup>。这种“明人伦”之“礼”，“不独大经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盖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sup>⑤</sup>。故以“礼”代“理”，研究的对象扩张到“冠昏饮射……揖让升降……豆笱鼎俎”<sup>⑥</sup>这样一些“器数仪节”上面。

阮元对“道”与“器”的表述，意思大致处于戴震和章学诚之间。按冯友兰的解释，“道”一词在汉语典籍中的意思至少有六种<sup>⑦</sup>，而阮元所说的“商、周二代之道”似乎无法归入其中任何一种，因为这是有时间性的“道”，与章学诚所说“周公之道”类似；但阮元所说的“器”则近于戴震，乃是与古文字极相关的钟鼎彝器。也就是说，“道”不再仅仅指百世不变、弥纶万有的东西，它有时也带时间性。可以说，阮元正是在“道”“器”这种结构概念下，进行了类似后世所说的“历史与材料”关系问题的思索。

这一组看似意义宽泛的词，反映了某种史学认识论的结构。无论此结构具体形态如何变化，它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史学与考古学中，尽管当时“道”

①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第2—10页。

②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2页。

③ 章学诚：《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转引自《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④ 凌廷堪：《复礼上》，《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

⑤ 凌廷堪：《复礼中》，《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

⑥ 凌廷堪：《复礼下》，《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

⑦ 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66页。其中，冯友兰也指出了“道”有“形以前”和“形以后”的区别。